

# 棒棒糖与烟火

郑惠芳

联合早报，2014年5月4日

在新加坡，我们的纠结在于，华社里面难免仍有尊重宗族观念的新加坡华人（他们同样也具有国家和官方母语意识）。同时也有不少不谙华语的新加坡华人强调自己是国家意识走先，不喜欢再被宗族观念捆绑。他们不再像祖辈一样喜欢腻腻的棒棒糖，而是向往让他们自由奔放的烟火。

一个多月前去听了一场名为无界限讲堂（由新加坡周星衢基金和 10AM 联办）的演讲，讲题是关于母语和母国的联系。主讲者是陈丹青先生。他是画家，也作文化评论，以犀利言辞和颠覆性思考著称。

当天，怀着期望前去。陈先生站上讲台没几分钟，便说自己对讲题“母语、母国”有了新的认识，原来在抵步后就有“当地朋友警告（讲题的敏感性）：你踩了雷区，要慎重对待，要不然你会伤人，也伤你自己。”随即也说：“新加坡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。”然后开宗明义，道明自己被教育了，明白在新加坡的华人不是“海外华人”而是“新加坡华人”。

听着，心里揪了一下。一位首来新加坡的知识文化人士初登国土，就感觉到被“警告”这里语言课题的不可碰触危险，并令他产生了如履薄冰的紧张心绪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地国人对这个课题仍无法摆脱自我设限。

陈先生的演讲以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铺陈他对母语母国的感受与想法。他指出，中国人的传统宗族观念强烈，并以此作为语言的情感归依。因此，一般中国人情系同宗、同族、同乡、同姓，相对来说，对“国家”、“母语”的概念不强。若我们以此概念展现在语言环境上，中国各地讲各自地方语言的人们，紧紧联系着我宗我族我语，无论日后脚走到哪里，心的最后归依只有一处。就像棒棒糖一样，虽然一圈一圈由内而外延伸，却都跟中心坚固地联系在一起，其中心拉力是拉向宗族观念，不是拉向单个“国语”或“国家”。这样的宗族观念，对二战后新兴国家和移民国家的建国目标显然格格不入。这些政府在建国初期都得先巩固人民对国家的身份认同，因此就有了“国语”，而当“国语”与“母语”不是同一个语言时，必定要国民先效忠“国语”，因此身份错位就此开始。

在新加坡，为华族新加坡人设定的官方“母语”——华语，与大部分华族先辈移民的祖语不同，因此新的“母语”的概念产生了，并随着之后的推广根深蒂固。新加坡政府灌输国人必须以“新加坡人”为先，宗族文化排其后，因此陈丹青先生领悟到新加坡人不是“海外华人”而是“华族新加坡人”。

被灌输了“国家”意识的人民，不管自己的祖先从什么地方移民而来，各自的“祖语”是以点的形式同“国语（这里解国家推崇的语言）”联系起来，因此，点与点之间没有强烈相联，像个炸开的烟火，而中心指向的，已不再是各自的宗族文化，而是一个“国家”的概念。

有着浓烈宗族观念的华人，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落地生根，仍然认同自己是“龙的传人”，跟其他海外华人一样同宗、同族、同文，但未必，也没必要同国。陈丹青先生想必是拿美国护照的，

但骨子里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因此当别人嘘他护照栏填的是美国护照时，他觉得“闷了”。他觉得自己是个拿了个美国护照的中国人，他自己没有疑惑，别人要是疑惑了，那别人自理就是了，干他何事？这是陈先生对身份认同错位的个人体悟与处理方法。

在新加坡，我们的纠结在于，华社里面难免仍有尊重宗族观念的新加坡华人（他们同样也具有国家和官方母语意识）。同时也有不少不谙华语的新加坡华人强调自己是国家意识走先，不喜欢再被宗族观念捆绑。他们不再像祖辈一样喜欢腻腻的棒棒糖，而是向往让他们自由奔放的烟火。于是就孕育了悲情、受伤和委屈，有了解不开、化不去的宗族文化情意结。

诚如陈先生所说：“母语，讲还是不讲？讲多少？讲到什么程度？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，一是自尊心，一是安全感。”

一个语言作为符号所负载的价值和情感，视个人的际遇和理解而起作用。有人认为华语背负了近代史上呈现的卑微、屈辱与阻滞，但无可否认，它也满载五千年文化的丰盛、璀璨与智慧。日常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是目的性地从语言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滋养自己的生活 and 身份，在不同的语境，呈现不同的态度。因此，看到母语智慧与丰盛的人，对讲母语觉得骄傲，增强了自尊心和安全感，就容易学得来、讲得出口；而反之亦然。

陈丹青先生追述跟他亦师亦友的作家木心以文字耕耘的一生后说：语言的困境所有人都会有，就看你要怎样在自己手中提炼它（或放弃它）。棒棒糖其实也可以不腻口，而烟火依然可以握在手中，只要肯，必定能拿捏得当，使用得即有自尊又安全。

**作者是政策研究所研究员**

Please click [here](#) for English version